

我们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初稿)

论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转轨变型

中华全国总工会生产保护部

张 存 恩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

近来，我们国家的领导同志，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要提高素质，要“转轨变型”。所谓转轨变型是指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都要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都要由生产管理型转变为经营管理型。（目前对这个问题说法很不一致，有的叫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有的叫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有的叫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管理型转变，也有的叫由生产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转变。说法不同，意思都是一个。本文拟用由生产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转变这个术语）。在当前提出企业转轨变型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意见。企业转轨变型不仅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也是当前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也是我们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一、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为什么必须转轨？

我们建国已经三十四年了。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三十二年了。三十多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建设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包括六千多大中型骨干企业；培养了近千万名各类专业人才，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也有不少的提高；我们生产了品种繁多的轻工业品，不仅较好地满足了国内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且能够大批出口，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00亿美元左右；我们的重工业生产了数万种机械设备，提高了机械装备的自给率，并且开始部分出口；我们的国防企业生产了包括洲际导弹和热核武器在内的武器系统；我们的工农业总产值一九五二年是八百二十七亿元，一九八二年增长到八千二百零六亿元，增长了九点三三倍，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一，一九八三年达到八千九百亿元。上述成就是客观现实，不但正直的中国人承认，就是连敌视我们国家的一些外国人，也不能不承认。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与我们的人民所付出的劳动相比还很不相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尽管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慢，但经济效益太差，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有过不少的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实践之中，还有许多必然王国未被我们认识。我们要从总结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中，逐步找出它的规律，逐步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一句说我们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正像邓小平同志一九

八〇年一月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所说的：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

三十多年来，我们有什么经验教训？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们实行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比较谦虚谨慎，摸着石头过河，作计划、办事情比较地实事求是，没有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因而也没有搞高积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积累率为24.2%（最高为25.5%，最低为22.9%）。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稳步发展，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2%，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在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的基础上，五年之内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42%。到一九五六年，提前一年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与此同期，我们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人们兴高彩烈，社会风气空前良好，人民对我国的兴旺发达充满了信心。许多人都说这五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再加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们的头脑开始发热了，一九五七年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一九五八年提出搞大跃进，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开始执行了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的政策。一九五八年积累率达到33.9%，一九五九年又突然上升到43.8%，一九六〇年是39.6%。在高速度、高指标的思想指导下，有人提出“一番两番不算番，三番四番是中游，七番八番才是上游”。于是大办钢铁，大办铁路，大办水利，几个大办同时上马，使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由于资金、物资、粮食都不能保证基本建设的需要，先是挤生产用材料，再不足又挤人民的生活，还不

行，不得不让大批工程下马，造成极大的浪费。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困难。不得不动员两千万职工由城市回到农村。许多地方的人民得了浮肿病，甚至个别地方饿死人。这些困难固然与天灾和外国撕合同、撤专家有关，但主要是我们自己头脑发热所造成的。由于经济极度困难，从一九六二年起，不得不把积累率降下来，一九六二年的积累率只有10.4%。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每年平均只增长0.6%，职工的平均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7%。失败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我们党在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巨大的调整工作。这三年平均积累率为22.7%，各方面的情况迅速好转，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5.7%，这个时期的增长带有恢复的性质。

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情况，刚刚有了起色，各方面的工作初步走上正轨。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起，又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国民经济带来第二次灾难，许多企业停工停产。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六年，平均积累率又上到32.7%，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7.8%。（这里有水份）。在这期间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的物质生活十分困难。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人们又看到了国家兴旺发达的希望，在这之后的两年里，又头脑发热了，不顾十年浩劫的后果，不看各方面的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又盲目上了二十二个大项目，因此，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的积累率又分别上升到32.3%和36.5%的水平，使国家财政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出现了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四个不

平衡。

一九七八年末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定了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为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又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农民占绝大多数，生产力的发展本乎低而又很不平衡。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既要量力而行，反对急于求成，又要积极奋斗，反对消极情绪。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党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的八字方针。大力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我们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调整了农、轻、重的比例，调整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中，我们体会到：凡是急于求成，搞高积累、高速度，积累率超过30%的时候，国民经济就发生困难；积累率超过40%的时候，就要饿死人；积累率在25—30%之间的时候，我们的国民经济就稳定、健康地发展，人民生活可以逐步改善。为此，我们党确定在经济建设中，今后积累率应保持在25%左右。在安排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的方针是：“能六则六，不能六则五，如果连五也作不到，每年增长4%也可以”。最后确定为“保四争五，在执行中力争超过”。从一九七九年起，我们开始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先后在若干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一九八〇年赵紫阳总理在五届四次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我们要走出一条速

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在这条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指引下，几年来我们的国民经济逐渐好转，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积累率由34.6%逐步下降为31.6%，28.5%和29%；工农业总产值的逐年增长率为8.5%、7.2%、4.5%、8.7%；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5.65%上升到33.59%；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也由43.13：56.87，调整为50.25：49.75。就是说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比较合适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出现人民多年盼望的买方市场。一九八三年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目前尚来统计出来。从现有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是很好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千九百亿元，增长10%左右。粮食总产七千四百亿斤，增产三百三十亿斤，约增长5%；棉花总产八千五百万担，约增长18%。五年来农业平均每年增长7.1%，工业平均每年增长7.2%。

“六五”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提前两年完成。上述情况表明，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走上了稳步健康发展的轨道。也说明我们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说：“六五”计划保四争五，“七五”计划保五争六，二十年之内平均每年增长7.2%，到本世纪末，使我们的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把握性更大了。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每一个循环，都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加深一步，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向前推进一步，直到最后取得成功。这是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实践认识真理、通过实践证实和发展真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只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发现它、认识它、发展它。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成功了不要骄傲，不要头脑发热，失败了也不要怨天尤人。而要从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去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力争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少付出一些代价。那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想法，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在成功之中也还会有许多问题要我们继续去探索、去解决。万万不要因为当前经济情况好转又头脑发热。

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还有不少问题，突出的问题是：产品质量差，消耗高，劳动生产率低，因而经济效益太差。目前我们的经济效益不仅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差，比我们自己历史上的水平差，甚至比一九八〇年还差。具体情况如下：

年份	工业产值 (亿元)	上缴利润 (亿元)	百元资金利税率
1980	4992	434.03	26.40
1981	5178	415.43	25.16
1982	5506	393.21	23.25
1983(1—9月)	4503	288.88(—1.8%)	(—0.36)

从上表可以看出，四年来尽管我们的工业产值连年上升，但给国家上缴的利润却在逐年减少。经济效益有许多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百元资金利税率，这个指标每提高1%，就可多为国家提供利税76亿元，如果一九八二年的百元资金利税率提高到一九八〇年的水平，我们每年可多为国家提供利税二百三十九亿元，就可以

使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

由于经济效益太差，不仅未能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也未能根本改变人民得到实惠不多的局面。一九八二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只有4247亿元，每个职工所创造的工业净产值不过两千四百元。每个社会劳动力创造的国民收入不过800元，全国有十亿零一千五百万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的国民收入不过418元。从这418元中还要扣除国防费、生产发展基金、行政管理费等等，作了这些扣除之后，才是人民得到的实惠，可这还能剩下多少呢？用这么一点财富，能对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多大作用呢？职工的后顾之忧四子——孩子、房子、票子、老子问题，怎么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呢？！那些挥霍浪费人民财富的人、那些拿公家的钱去作公费旅游的人、那些饱食终日，光拿人民的钱不干事的人，他们应该扪心自问，浪费人民的财富就是对人民犯罪！

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为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我们必须用大力气，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要用最少的人力物力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一句话就是说要提高经济效益。这就是我们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必须“转轨”的原因。

二、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为什么必须由生产管理型转变为经营管理型？

过去，我们在处理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的盲目性。我们头脑中总有一个框框，或者叫一个模式。不考

虑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而又不平衡的具体情况，总认为在所有制问题上，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越高越革命，越高越接近共产主义，越高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个观念在相当多的同志的头脑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思想框框的指导下，不管条件是否成熟，总想把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向更高一级过渡。在农村，初级社还不巩固，就办高级社；高级社还很不成熟，就办人民公社，而且强调“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结果是“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分配的时候两手空”，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城市，街道办的小集体企业一办好，就向区属大集体过渡；区属大集体企业稍有发展，就收归市属企业或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再加上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合理，全民企业、集体企业一刀切，使许多集体企业失去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特点，集体企业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使集体企业的积极性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致于不剥削他人的个体经济，虽然我们宪法允许它存在，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已经基本被搞光了。由于所有制结构过份单一，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许多产品实行调拨的办法。产品经济占了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

人们在这样作的时候，本来期望能更好促进生产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更快地改善。但事与愿违，由于所有制结构不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果出现了吃饭难、作衣难、住店难、订奶难、买东而难等等。使人民生活极为不便。一方而市场上物资奇缺，另一方而又把大量的蔬菜烂掉，整车的韭菜往垃圾箱里倒；有些企业公有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益越低，浪费越大。如北京市国营养鸡场，每只鸡平

均投资24元,三年才能收回;每交给国家一斤鸡蛋,要用3—4斤饲料粮。集体养鸡场,每只鸡平均投资20元,两年半收回,交售一斤鸡蛋只要二斤饲料粮;农村个体养鸡户,每只鸡平均投资7.5元,当年收回还有收益,每交售一斤鸡蛋,只奖给一斤粮票。

更严重的是出现了大量的事无人干,又有大量的人没事干的现象。有一个时期,有两千多万知识青年待业,成了一个影响安定团结的带有爆炸性的重大政治问题。一九七八年初,从西双版纳回来的知识青年,在天安门广场闹事。表面上看是几个青年闹事,实际上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个规律在惩罚我们。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第四节,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的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两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是由偶然事件支配着的,但是,表面上是偶然事件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问题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我们经过二十六年的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使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逐渐认识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而又很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不能过份单一化,只能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在很长时期内采取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的政策。即在农村,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城镇手工业、工业、建筑

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有相当部分应由集体举办。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只有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才能繁荣城镇经济、方便人民生活。既然是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各种经济形式之间交换产品，只能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而不能再采取产品调拨的形式。因此发展商品经济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们这样处理所有制结构问题和发展商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举，近两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今后的历史将会继续证明它的重大意义。它将是许多后进国家工人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都应遵循的客观规律。

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过去我们长期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虽然有过两次想改变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情况，但也只是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兜圈子。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个人四方而的积极性问题。

由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长期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国家计划是指令性计划，计划就是法律，企业必须执行，没有机动处理的余地。国家给企业下达生产任务，生产什么东而，生产多少，生产什么品种、规格、交货期都由国家规定。原材料由国家调拨。生产出来的东而，属于生产资料的由物资部门统一调拨，也就是说，在这种经济管理体制下，许多产品是用产品调拨——产品经济的办法进行交换的。属于生活资料的，由商业部门统购统销，企业销售自己的产品是不合法的。企业所需的劳动力，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无权根据自己的需要，择优录取。企业的财务制度是统收统支，

专款专用，打油的钱不能买醋。在这样的经济管理体制下面，企业的任务就是搞好管理工作，组织好生产。管好企业，搞好生产，完成国家计划是企业的天职。因此，我们说过去的企业是生产管理型的。在那种经济管理体制下面，我们的企业只能是生产管理型的。

生产管理型的企业以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为中心，制订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企业的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以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为轴心来安排。安排工作的顺按产、供、销。根据产供销的需要搞好企业的计划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劳动管理、设备管理、调度工作、安全工作、后勤工作。尽可能作到安全生产、文明生产、均衡生产。只要完成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就算是好企业。产品销售用不着企业操心，致于产品是否适销对路，用不着企业管，就是积压在仓库里，与生产企业无关，甚至最后不得不报废处理，也是由国家财政核销，与企业无关。在这样的经济管理体制下面，企业没有必要的自主权，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无从发挥；再加上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奖惰罚勤，也严重地妨碍广大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其后果是劳动效率低、质量差、消耗高、大批产品积压，一九八二年积压在仓库里的机电产品有628亿元，决定要报废的有100亿元。许多商品几十年一贯制，暖水瓶、缝纫机、自行车，几十年不变样式。劳动生产率越来越低：煤矿工人在解放初期，用打眼放炮、手镐采煤的方法，每工采煤1.12吨，一九八二年降为0.912吨，一九八三年又降为0.88吨。建筑工人在五十年代，用手工砌砖，每人每年竣工房屋面积为31平方米，一九八二年为二十四点六平方米。这就是集中过多、统得过死所造成的恶果。为改变这种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状况，一九七

八年我们曾提出过，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但因当时没有指出主次之分，实行的结果，又出现了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情况。一九八一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确定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确定了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并对这个原则作了科学的准确的表达，即：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合理配置和发展的政策，贯彻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都要求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面向市场、面向消费者，通过发展商品生产的办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也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的又一步深化。而正确地贯彻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又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中，要正确地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职工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要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或者叫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充分发挥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积极性，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了在多种经济形式之间的进行商品交换，为充分发挥企业做为相对独立的商品者的主动性积极性，企业由生产管理型转变为经营

管理型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变型的原因。

三、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对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作了决定。决定指出：当前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八亿农民的积极性。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我们的农业工作者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认真调查、细心地研究农民群众的创造。把农业经济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生产的管理体制，和“基本口粮加工分”的分配制度。逐步发展为以户为单位大包干的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中间经过，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包工包产、联产计酬；部分生活困难的地区“也可以包产到户”。农民说“也可以好着哩”。现在绝大多数农户都实行了以户为单位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就是土地公有制不变，固定包给农民使用，农民收获的产品，除了交给国家的公粮、五保户和公益事业所需的公益金以及干部补贴工分之外，剩下的全归农民个人所有。

在牧区：由集体放牧，改为个人承包。个人承包的办法，由两定一奖，发展为保本保质，比例分成；作价保本，提留包干；作价保本，提留包干，现金兑现；现在正在酝酿不以畜群为主，而以草

场为主的大包干责任制。由于这些办法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近五年来，尽管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还是连年迅速发展。农业总产值由一九七九年的1584.3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为2138.8亿元）到一九八二年增长到2629.2亿元，增长了22.9%；粮食产量由一九七九年的30475万吨，一九八三年增长到37000万吨，增长了21.4%，棉花由一九七九年的216万吨，一九八三年增长到400万吨，增长了85.1%；农业的迅速发展，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为城市人民提供了更多的粮食和付食品，也为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一九八三年农业机械的总产值达到83亿元，小型拖拉机的产量几乎翻了一番，仍然供不应求；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由滞销变为畅销；多年来积压滞销的合成纤维和棉纤维混纺的织物，销路大增等等，就是很好的例证。过去农业是老大难，长期拖国民经济的后腿，现在却走在前面，为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为什么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产？是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比城市强？还是农村的党风比城市更好？都不是。农业生产之所以连年大幅度增长，主要是我们党的政策对头，党的农业政策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一句话说，我们初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道路。现在90%以上农户都实行了以户为单位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通过这种办法，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我们坚持了土地公有制，严禁土地买卖，这是集体经济的基础。通过以户为单位的大包干的办法，我们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和农业的经营形式区别开来；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管理

权区别开来。土地公有,但不一定是集体生产,而是通过承包的经营形式、把土地的使用权、管理权交给农民;我们不是用集体生产的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而是在流通领域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村发展商品生产,使农民的产品变成商品,通过商品流通的形式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生联系。

(二)通过承包的办法,把土地包给农民使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农民有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合理种植。什么东西产量高、收益大,就种什么。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劳动力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了,农民有权合理地使用和管理生产资料。人民群众真正成了创造历史的动力。等到农民再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的时候,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作用将要更大的发挥出来。

(三)土地固定承包给农民使用,农民的劳动成果,除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体现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人民真正成了自己劳动成果分配的主人。

(四)因为土地较长时间固定给农民使用,农民不仅要考虑到当年收获好、收益高,还要合理倒茬、改良土壤,增加土地的肥力。做到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

由于我们党的农业政策,较好地解决了上述四个问题,才能在农村较好地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再加上农村商业体制的改革,把单渠道、多环节的流通体制,改变为多渠道少环节流通体制,较好地做到货畅其流。使农业产品变成商品,使价值和使用价值得以统一起来。这才使我们的农业连年增产增收,而且

在继续发展,方兴未艾。当然农业在前进中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需要我们按照农民的愿望、细心地总结农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进。

农业战线的成功对理论界和工商企业都给了很重要的启示。要求理论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到群众中去,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给以理论的说明,并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好地前进。过去我们常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在革命斗争中,在解决对抗性的矛盾的时候,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是对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时,或者虽然是对抗性矛盾,但尚未发展到爆发阶段的时候则要认真研究矛盾的同一性。譬如农业的成功,就是我们找到了在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农业的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期利益与眼前利益这些对矛盾,是在什么条件下,处于一个统一体的,是怎样斗争的,在什么条件下向好的方面转化的。找到矛盾的同一性,找到矛盾同一的条件,确定为党的政策,促进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达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目的,这是农业的成功给理论界的启示。

农业的成功给工商企业的启示是:要把农业取得成功的那些带普遍性的原理,应用到工商企业中来。农业取得成功的带普遍的原理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管理权区别开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全民,但全民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应属于该企业的全体职工;职工群众应该是那个企业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应该有权妥善管理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既为国家多创造财富,又为自己创造幸福生